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

康保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规划系,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 北宋前期,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 但总体而言, 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宋文化重心的成因与北宋初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向被消灭政权攫取文化资源以及京畿文化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 文化重心; 政策; 文化优势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04) 04—0109—05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 古代经济和文化重心都发生了南移,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政治格局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尽管得以确立, 但文化重心的南移却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大文化模式”^{[1](P99)}。这种“大文化模式”当指文化重心位于南方的持久性、稳定性而言。笔者曾以学术中心、教育状况等作为考察的重点, 通过对各类人才、书籍状况的统计分析, 认为北宋前期,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 但总体而言, 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以北宋四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以及太原等地文化较为发达。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统一大业尚未完成

公元960年, 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 建立了北宋。立国之初, 与宋朝相存并立在南方的还有南唐、吴越、南平、后蜀等政权。

北宋建立的第四年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为避免两面(南北)作战的不利局面, 北宋政府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先消灭南方割据政权, 然后北上削平北汉以及收复幽云地区。乾德元年(963年), 北宋首先出兵灭掉荆南和湖南, 又陆续灭掉后蜀、南汉和南唐。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俶相继归附, 南方割据政权全被宋朝武力征服。经过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 北宋政府基本上结束了自唐中叶“安史之

乱”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实现了南北主要地区的统一。从发展文化事业的角度看, 战争必定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北宋政府与南方割据政权之间统一与被统一的战争, 不仅牵制了北宋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 对南方政权来说, 他们的领土辖区沦为战场, 对文化人、文化事业的摧残无疑是巨大的。因此, 从各项文化要素的对比来看, 南方文化不如北方文化发达, 战争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学者指出: “至少在‘澶渊之盟’以前, 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不仅是北宋政治、军事重心, 而且是宋代赖以立国的生命线。”^{[2](P32)} 北方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影响到文化地位的重要性。

二、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

通常情况下, 最高统治者在立国之初, 常常重用起家之地的人士做幕僚。这不仅因为他们同普通人一样, 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 而且因为其起家之地亦是他们的根据地所在, 有一批跟随他南征北战打江山的心腹兄弟, 他要从地域认同中寻求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让这些人居朝中要职, 封建帝王才有安全感。例如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 就重用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据统计, 唐代357名宰相, 生于北方的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的宰相有326名, 占91.3%, 而属于南方的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的宰相仅有31名, 占8.7%^[3], 政治人才的南北地域差异非常明显。五代十国南北相互隔绝了50余年, 政治独立、军事

收稿日期: 2004—04—05

作者简介: 康保苓(1973~), 女, 山东青州人,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规划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旅游文化学、休闲学研究。

封锁，各个政权各自为政，更强化了南北之间的地域偏见。北宋王朝在中原立国，北方是宋朝的统治基地、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延续了地域偏见的传统，以胜利的征服者自居，在政治上对南方人有所防范，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方面有些轻视，南北之争比较明显。

1. 在官员的任命上重用北方人

南北人才的地域之争首先表现在统治者对宰相的选择方面。宋初统治者，存在严重的地域偏见，奉行“不用南人为相”的原则。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记载：“祖宗（指宋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至真宗始用闽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四记载：“艺祖御笔：‘不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大）内中。”成书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话》进一步分析，认为确有其事。

从实际情况看，北宋初期“崇北抑南”的文化心理比较盛行，“不用南人为相”的做法在太祖、太宗两朝和真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贯彻着。

直到天禧元年（1017年），南人不为相的传统才被打破。这一年，王钦若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北宋用南方人为相之始。之后，天禧四年七月庚午，以枢密使、吏部尚书丁谓为平章事（即宰相）^{[4]（卷96）}，丁谓（966~1037年）是苏州长洲人，淳化三年进士。他是北宋时第二位南方籍宰相。

宋初统治者对翰林学士的任命也存有地域偏见。翰林学士是为封建帝王起草制、诰、诏、令并备咨询顾问的高参和机要秘书，“经营庶务，进退大臣，未尝不预咨询”^{[5]（卷20《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制》）}。从统治者对翰林学士的任命来看，“仁宗之前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翰林学士中的北方人占绝对优势，分别为当时总数的89%，78%，70%。特别是太祖时期，先后用的9个翰林学士，除欧阳迥一人是留用后蜀旧官外，其余8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方人”^{[6]（P94）}。

宋初，统治者不仅在朝中宰相、翰林学士等高级官员的任命上存在南北偏见，而且在地方官的任用上也是如此。本来，宋政府任用地方官时，一般不回避官员的家乡，有时甚至特意让本地人做本地官，因为他们熟悉当地及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7]（卷28《郑宣通判睦州》）}。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下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4]（卷55，咸平六年七月庚寅条）}但对刚刚收复的南方地区就不同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宋初朝廷明文规定南方人不得在本地为官，“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

判、转运使及诸事任”^{[4]（卷23，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戊寅条）}。也就是说，在四川、广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等广大范围的南方地区，不能用本地人任本地官。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这种局面直到宋真宗统治时才有所改变。天禧元年（1017年）下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4]（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癸亥条）}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官。”^{[4]（卷97，天禧五年七月戊戌条）}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

2. 科举取士倾向于北方人

唐代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尚不明显，“有唐一代，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地位，只是由于科场初开，各地在科举竞争中的矛盾尚未显现出来，所以唐代还没有出现关于科举取才的南北地域之争”^{[8]（P155）}。到宋代，情况就不同了，科举取士中南北地域之争很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考试内容上限制南方人入仕。针对南方人擅长诗赋，不擅长策论的特点，冯拯极力建议科举取士时兼考策论，以此限制江、浙士人入仕。《长编》卷68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癸未，诏礼部贡院，诸科举人虽初举而材艺可取者，与进士第……冯拯（时为参知政事，孟州河阳人，即北方人）曰：‘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上然之。”《宋史》卷285《冯拯传》记载：“大中祥符初，严贡举糊名法。拯与王旦（宰相）论选举帝前，拯请兼考策论，不专以诗赋为进退。”

其二，在各地解额、录取人数、考试场次上优待北方举子。宋真宗景德年间，宋辽战争结束后，北宋政府考虑到河北地区作为战场，人民遭受战乱之苦，读书人学业荒废，就专门为河北举人举行了一次单独的优待考试。考试内容简单，所有举人全被录取，所谓考试只是徒有形式而已。《宋朝事实类苑》卷63《谈谐戏谑》二十二记载：“景德中，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状元，张存、任弃虽事业荒疏，亦皆被泽。时有无名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弃能烧猛火油。’”张存、任弃都是才疏学浅的粗人，居然被录取，带有明显的地域偏向性和照顾的因素。

其三，在最高阶段的考试——殿试中抑制南方人中状元。真宗晚年，北方籍大臣还推行抑制南方人的政策。“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三月癸卯，上御崇政殿覆试，得进士蔡齐以下百九十七人……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今属江西）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

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4]（卷⁸⁴）}胶水是今山东省平度市，蔡齐是北方人。这个事例体现了明显的地域歧视。

其四，省试中也存在着歧视南方贡士的倾向。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江西人陈恕知贡举。他担心得罪北方人士，“自以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9]（卷267《陈恕传》）}。这种做法，就有失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原则了。对此，脱脱评论说“陈典贡举，务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为也”^{[9]（卷267，“论”部分）}。

其五，在对年轻有为者的任用问题上，北方籍大臣欲限制南方人入仕。宰相寇准是华州下邳（今属陕西省渭南县）人，有抑制南方人之意。据《长编》卷60记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特召试……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其限遐邇？如前代张九龄辈何尝以僻陋而弃置耶？’乃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唐玄宗朝的宰相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宋真宗用张九龄为相的例子反驳寇准抑制南方人才的意图。

宋初统治者推行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方人才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崛起，从治国的大局来看，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才，不分地域，都应量才选用，惟才是举。南方士人在北宋初期颇不得志，但是，随着南方的逐步统一和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大批南方人逐渐入仕朝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宋真宗统治后期起，南方籍的官员在朝廷中相当活跃，他们在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同时，形成与北方籍官员相竞争的强大势力。

三、中央向被消灭的政权搜取文化资源

这里的“文化资源”，既包括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发展的实现者——人才，又包括文化成果的载体——图书。北宋政府想方设法从被消灭的政权手中搜取了大量的人才、书籍，不断充实和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

1. 搜取人才

葛剑雄先生在《古都与移民》^{[10]（P116）}一文中指出，统治者“强本弱末”、“强干弱枝”的观念还表现为“运用皇帝的权威和首都的地位镇压敌对势力、控制不稳定因素的措施。前朝或被灭政权的国君、宗族、文武官员，异族政权的首领、降人，敌对政权降、俘的将领官员，地方豪强、富户和特殊的罪犯等，都有可能是安置在首都的对象”。南方各割据政权灭亡后，北宋统治

者推行“强本弱末”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不稳定因素”，笼络人心，防止再起分裂；被安置的对象主要是各割据政权的国主、王室、贵族、部分官员等。其时“亡国之雄军，诸侯之陪臣，随其王公，与其士民，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乡党，率彼宗亲，尽徙家于上国”，致使东京“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11]（卷2《皇畿赋》）}。如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后蜀国灭，后主孟昶与他的弟弟、两个儿子、宰相及其他官员均举族北迁，到开封的人数很多，护送孟昶的“辎重之众，百里不绝，至京师犹然”，规模盛大。开宝八年（975年），南唐国灭，后主李煜及宰相汤悦等45人被宋将曹彬送到开封。

南唐、吴越、荆南、南汉、后蜀、北汉的国君大臣被集中到开封后，形成数量众多的上层移民群体。为了稳定移民的情绪，巩固北宋政权的统治；也为了充分发挥和挖掘移民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宋王朝，北迁的移民中许多王室成员和文臣武将被重新任命，享受优厚的待遇。宋太祖平定后蜀之后，下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赐装钱有差；治行清白为众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闻。”^{[4]（卷6，乾德三年丙午条）}当时，除南汉政权因在城破前夕焚烧府库、官员因此未能得到北宋政府的优待外，南方各割据政权的官员以其较强的政治能力或文化素质，在归宋后受到了优待和重用。各割据政权的官员入宋后不仅没有受到轻视，反而被委以重任，这是北宋政府的明智之举，也提高了这些官员效力于赵宋王朝的积极性。

一批学识很高的文化人也被重用，如南唐降官徐铉、张洎、吴淑、舒雅，后蜀降官句中正、欧阳迥等。宋太祖得到徐铉、汤悦、张洎等江南著名文臣时，喜形于色，对他们说：“朕平金陵，止得卿辈尔！”^{[12]（卷上）}徐铉是南唐文坛的领袖，到开封后，“儒笔履素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祐]与之交款，李至、苏易简咸师资之”^{[12]（卷下）}。徐铉弟弟徐锴是著名文臣，亦受重用，《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卷10《徐铉双溪院记》记载：“五代干戈之乱，儒学道丧，而二君（徐铉、徐锴）能自奋然为当世名臣。而中国既苦于兵，四方僭伪割据，皆褊迫扰攘不暇，独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优游其间。及宋兴，二徐得为王臣，中朝人士倾慕其风采，盖亦有以过人者。”张洎是南唐后主的宠臣，“少有俊才，博通坟典”，入宋后倍受礼遇，曾与李至、范杲、张昞同修国史，又判史馆，官至参知政事。他因为“博涉经史，多知典故”，被宋太宗誉为“江东士人之冠”^{[9]（卷267《张洎传》）}。宋初，编修四大类书的学者，多为归降的南方文臣。

南方降官举家北迁，其亲属、后裔中，很多有着深

厚的家学渊源，他们在北方读书、成长，为北方文化输送了新的生力军。南唐官员黄裳原为江西临川人，南唐灭亡后入北宋朝廷任职，官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直史馆，“子孙多显者，于是又迁其家为河南人焉”^[13]（卷98《宁国县太君乐氏墓志铭》）。吴越王钱氏，堪称文化世家，培养了许多才子，既有诗人、文学家，又有擅长绘画、书法的艺术家，还有著名的藏书家。吴越国献土投降、和平归附后，钱氏全转移到了开封，将南国文化播洒到北方土地上，为繁荣京师文化做出了贡献。

随着南方各地方政权的灭亡，很多艺术家也被集中到开封。这其中既有著名的画家，又有优秀的音乐家。如乾德三年（965年）平蜀后，后蜀画院的黄筌父子、高文进、袁仁厚、夏侯延祐等随蜀主孟昶到了开封，被授以翰林图画院待诏、祇候、学生等职；开宝八年（975年）平南唐后，南唐画院的周文矩、董羽、顾得谦、厉昭庆、董源、徐崇嗣等随后主李煜到了京师，供职于翰林图画院。宫廷乐舞是统治者享乐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精神风貌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原有音乐舞蹈体系经五代战乱而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北宋政府组织人力资源，集中全国各地的艺术人才，重新创建雅乐、燕乐。“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技艺之精者皆在籍中。”^[9]（卷142《乐志十七》）可见，宋初的国家音乐团成员大部分出自原来的各地方政权。

各地方政权的文人向开封等北方地区迁移定居，南北文士互为师友，互相唱和，取长补短，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迁自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移民，在迁入地又拥有足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移民，对文化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最大”^[10]（P129），各地方政权的王室贵族、官员、文人当属于这类移民，他们为北方文化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搜取图书

在平定南方诸国的过程中，北宋政府不断把被征服地区的官府藏书运到东京汴梁，充实三馆藏书。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尽收南平高氏藏书，全部交归三馆收藏。“太祖平江南，赐本院书三千卷，皆纸札精妙，多先唐旧书，亦有是徐锴手校者。其后散失过半，惟演再入院，编排得千余卷而不成部秩，其九经、三史、三国志、晋书，即是晁迥、李宗谔在院时奏请其书印署部秩。”^[14]（卷50《书画伎艺》“太祖赐翰林院书画”）北宋政府从后蜀、南唐得到的图书数量最多。乾德三年（965年），平定后蜀，专门派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藏书13000卷，藏于史馆。开宝八年（975年）平南唐，令太

子洗马吕龟祥到金陵，收其藏书20000余卷，悉送史馆收藏。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吴越国王钱俶归附，又收吴越图籍，“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14]（卷31《词翰书籍》），藏于三馆。到太平兴国三年崇文院建立时，三馆已有藏书正、副二本合计46000卷。这还不包括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平定北汉后，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太原城点检收缴的书籍、图画数量^[15]（P714-715）。

随着南方大量人才和书籍源源不断地集聚到北方和开封，南方在五代十国割据时期所形成的各地域文化中心地位有所弱化甚至消失，长江文化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而作为北宋京师的开封以其独特的优势地位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四、京畿文化优势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仍然位于北方，与开封的京畿文化优势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都城的开封，是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心，对人才有强烈的吸引力。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往往搜罗大量人才聚集京师，这其中既有政治精英，又有高素质的文学艺术人才、科技人才；同时，政治中心的教育机制完备，使其又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文人士大夫为了走上仕途，常常宦游京师。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社会安定的环境中，政治中心就成为文化最发达、文人最密集的地区。大批学识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政治人才任职于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他们在活跃于政坛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丰富着京城的文化。一批著名的学者因文化活动长期在京师驻留或定居。

京师是科举取士的中心。北宋大大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据记载，宋太宗在位的二十二年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9]（卷293《王禹偁传》）。礼部贡举，“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9]（卷155《选举志一》）。京城选举权高度集中，浩浩荡荡的应考大军蜂涌至开封。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全国各地发解到京城开封参加礼部省试的贡士达五千三百余人^[4]（卷18）；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正月，两京、诸道州府贡士一万两千六百六十人^[4]（卷24，太平兴国八年春正月丙戌祭）；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正月六日，诸道贡举人万七千三百，皆集阙下”^[4]（卷33，淳化三年春正月丙申祭）。大规模的科举活动造成全国性的人才大流动，以应举为中心形成的科举文化为京畿输送新鲜的血液，对帝都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士子们饱读诗书，又适逢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之时，必然用诗文抒发豪情壮志，共叙乡情、友情，常常有佳作问世，京师成为巨大的文学创作中心。

京师有很多聚会、宴饮、钱送、登临游览等活动。

以这类活动为中心，士大夫自行组织聚会，包括诗社、文社等多种形式，这是文人士大夫以交接士朋、寄情适趣、纵情山水、品茗吟咏、置酒为文为目的的团体，不但丰富了文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加深了文友诗朋之间的友谊，而且能促进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互相切磋、交流。

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一文认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既有重合的一致性，又有分离的互动性”^{[16] (P56)}，从先秦至五代，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重合的一致性较明显；在北宋时期，开封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重合的一致性表现得较为明显，政治中心对文化中心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得依然突出。东京开封以发达完备的文化机构，浓郁的京师文化氛围，吸引着精英人才的汇集，从而成为人才密度最大、质量最高的地区。

总之，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发展具有长期性、延续性的特点。文化重心南移受文化发展惯性的影响。同时，文化重心南移的速度不是匀速的，有几个非常的迅速南移的阶段，这些非常阶段的产生，是在长期文化发展基础上受偶然事件作用的结果。文化的发展不仅存在时间的不平衡性，而且具有地域的不平衡性。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是如此。北宋前期文化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特别是与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以及长期以来文化发展的惯性密切相关。

(本文为笔者博士毕业论文一部分，承蒙尊敬的导

师徐规先生悉心指教，在此谨向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杨倩描.论北宋前期“北强南弱”文化格局产生的原因[J].河北学刊,1999,(2).
- [2]肖华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规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
- [3]傅衣凌.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研究[J].社会科学,1935,(4).
-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 [5]曾巩.元丰类稿[M].四部丛刊初编本.
- [6]杨果.宋代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J].武汉大学学报,1988,(6).
- [7]苏辙.栞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1).
-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葛剑雄.葛剑雄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1]吕祖谦.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2]田况.儒林公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1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5]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 [16]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J].学术月刊,1998,(3).

The Causes of Forming of the Center of Cultural Grav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orth Song Dynasty

KANG Bao-ling

(Tourist Plan Department, Zhejiang Tourism College, Hangzhou, 3112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Song, the center of cultural gravity wa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t was relat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olicy of appointing, the cultural superiority of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The center of cultural gravity; The policy of appointing; The superiority of culture

[责任编辑:杨 究]